

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的论争与研究动向

潘少奇^{1,2}, 李亚婷², 苗长虹², 李江苏², 吕可文²

(1. 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4; 2.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暨黄河文明
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嵌入”是理解转移企业与承接地集群以及全球/跨区生产网络互动耦合过程和机理的有效理论工具。自“嵌入”概念引入经济地理学以来,学界对转移企业地方嵌入意愿存在“被动”与“主动”的论争,对嵌入效应也存在积极与负面两种不同观点。通过对转移企业地方嵌入主要动因、影响因素、演进过程、区域效应等研究的系统梳理,发现不论基于“主动”还是“被动”意愿,转移企业地方嵌入都是其在“企业—地域”关系演化中维护并强化自身竞争力的地理敏感战略;嵌入过程受承接地条件、转移企业特质的双重影响;嵌入沿着“关系培育—价值链衔接—全球与地方生产网络战略耦合”的路径,逐步实现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转移企业地方嵌入为承接地集群转型升级提供了“区位优势窗口”。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研究今后需在四个方面加强和深化:一是构建一个以“关系—网络—演化”为主线的综合性分析框架;二是加强转移企业网络角色与绩效的定量研究;三是加强转移企业经济嵌入、技术嵌入、社会嵌入的相互影响研究;四是加强转移企业与承接地集群“双向嵌入”研究。

关键词:产业转移;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研究动向

1 引言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中国未来应继续坚持推进自东向西的区际产业转移,以消弭区域差异,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李国平等, 2016)。产业转移过程实际是“企业/产业—地域”相互作用的过程,是转移企业从转出地到承接地之间“脱嵌—再嵌入”的过程(杨玲丽, 2015; 杨伟聪, 2017)。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的模式和深度,既决定着是否能够实现企业区位转移的战略目标,又对承接地集群转型升级具有重要影响。那么,转移企业是否具有嵌入承接地的主观愿望,其驱动因素是什么,过程和路径是什么,对承接地集群发展或产业升级又有什么影响?围绕这些问题,本文试图在系统梳理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总结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研究的演进脉络,分析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的主要动因、影响因素、过程模式、区域效应,

提出需要加强和深化的前沿研究方向。

2 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研究演进脉络

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济地理学者开始关注以跨国投资为代表的国际产业转移现象。理论研究方面,形成了雁阵模式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梯度推移理论等基于不同实践经验的理论模式;实证研究则主要从宏观视角分析跨国投资的时空格局(Bagchi-Sen et al, 1989; 李小建, 1996)、区位选择(贺灿飞等, 1997; 贺灿飞等, 1999)、区域效应(Sun, 1996; 魏后凯, 2002)等。早期的产业转移研究中,较少专门开展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研究,但已有学者注意到了跨国公司在承接地的空间行为和嵌入效应问题。比如,有研究发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的电子消费品产业通过后向联系

收稿日期:2017-11-06;修订日期:2018-02-1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01133, 41430637, 41401129);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4YJC790092)[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41401133, 41430637, 41401129; MOE(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China) Projec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14YJC790092]。

作者简介:潘少奇(1980-),男,河南临颖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 E-mail: psq@henu.edu.cn。

引用格式:潘少奇, 李亚婷, 苗长虹, 等. 2018. 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的论争与研究动向[J]. 地理科学进展, 37(6): 844-852. [Pan S Q, Li Y T, Miao C H, et al. 2018. Debates and research trends of local embeddedness of transferred enterprises[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7(6): 844-852.]. DOI: 10.18306/dlkxjz.2018.06.011

较好地嵌入了中国台湾地区的产业系统,并推动台湾经济实现迅速发展(Schive et al, 1990);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工业化项目”(border industrialization program),则弱化了转移企业与地方企业的联系,并最终导致墨西哥电子消费品产业的衰落(Lowe et al, 1999)。

20世纪90年代,经济地理学出现了制度、文化、关系转向的热潮。在此过程中,“嵌入”(embeddedness)作为一种重要概念被吸收到新经济地理学尤其是新区域主义的理论框架中(苗长虹, 2004; Yeung, 2005)。嵌入原本是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指经济行动原则上总是“嵌入”在某些社会结构形式中或者正在运行中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系统中。对嵌入的理解一般包含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两个维度(Granovetter, 1985),前者指经济行动者嵌入其所在的关系网络中并受其影响,后者指在更宏观的层面上行为者们所构成的关系网络嵌入由其构成的社会结构中。基于上述转向背景和嵌入理论影响,经济地理学者开始更多关注转移企业地方嵌入过程中的关系构建、制度约束、文化影响等问题。有学者发现,中国香港企业在嵌入东南亚地方生产网络时,血缘、亲缘、乡缘等非经济关系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Yeung, 1997);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设置的“产品本土生产率政策”门槛迫使汽车业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通过合资形式嵌入了中国的产业体系(Depner et al, 2005);同时在波兰,由于跨国公司想绕开地方网络和制度的障碍而产生了“沙漠中的教堂”(cathedrals in the desert)现象(Hardy, 1998)。鉴于制度、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对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的影响,有学者提出了“被动嵌入”(obligated embeddedness)的概念(刘卫东, 2003; Liu et al, 2006)。

进入21世纪后,曼彻斯特学派在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s, GCCs)、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 GVCs)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的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PNs)理论,更加强调跨国公司嵌入区域的地域基础和地理敏感性,并重视嵌入、权力、价值等维度间复杂而活跃的相互依赖关系(Henderson et al, 2002; Coe et al, 2004; Hess et al, 2006)。Hess(2004)在经济社会学、管理学对嵌入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转移企业地方嵌入过程中制度厚实、组织模式的影响,提出了社会嵌入、网络嵌入、地域嵌入等三种维度。由此,更多研究开始从GPN视角出发,分析转移企

业地方嵌入过程中全球与地方的战略耦合问题。相关实证研究发现,IC产业跨国公司在上海浦东的地域嵌入正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加深(文嫣等, 2007),特斯科通过与韩国本土零售商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从而实现了在韩国的深度嵌入(Coe et al, 2006),而沃尔玛在德国的投资失利则应归因于未能有效嵌入德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网络中(Coe et al, 2006; Christopherson, 2007)。同时,鉴于GPN理论对全球与地方生产网络战略耦合的重视,也有学者研究国际代工企业在跨国公司生产网络和地方组织网络中的“双重嵌入”问题,还有更多研究关注承接地集群在GVCs、GPNs中的嵌入和升级问题(景秀艳等, 2007; 梅丽霞等, 2009; 曾咏梅, 2011)。

目前,经济地理学一方面继续从宏观视角开展产业转移时空格局和区域效应研究,另一方面则不断加强从微观视角开展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的相关研究(图1),具体包括转—承双方的企业网络构建(Hsu, 2006; 潘少奇, 2015; 陈肖飞等, 2018)、技术溢出与学习创新(Giroud et al, 2012; 张建伟等, 2016; 张占仁等, 2016)、社会资本作用(Buckley et al, 2006; 毛广雄, 2010; 谭文柱, 2012)等。而且,随着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理论和实证研究不断深入,Granovetter(1985)提出的两种嵌入维度和Hess提出的三种嵌入维度已经被逐步分化拓展,并形成了经济嵌入、技术嵌入、社会嵌入、政治嵌入、文化嵌入、制度嵌入、认知嵌入等一些更为细致的分类概念(Zukin et al, 1990; 陈景辉等, 2008; 邱国栋等, 2010)。虽然学界对将嵌入概念进行过分地域化(overterritorialized)的现象还有争议(Hess, 2004),但在实证研究中,这些细分概念既能比较清晰地描述转移企业的地方嵌入行为,又便于开展嵌入机理尤其是几种嵌入行为的相互影响研究,因此应被视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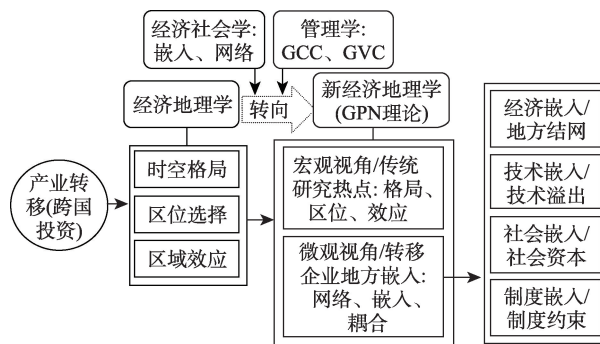


图1 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研究演进脉络

Fig.1 Change of the research on local embeddedness of transferred enterprises

是对嵌入理论的发展和增益。

3 转移企业地方嵌入意愿

关于转移企业是否有嵌入承接地的主观意愿,学界存在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地理学家一直强调“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区域产业集聚、地方网络、制度厚实(institution thickness)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仍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正如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产业转移的阐释,不仅考虑企业本身的垄断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同时也强调了东道国的区位优势。转移企业地方嵌入有助于其实现市场接近、劳动力接近、资源接近的战略目标。例如,虽然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还存在一些政策上的不确定性,但受中国移动市场巨额利润的诱惑,西门子公司还是主动地嵌入中国的移动标准创新网络中并取得了巨大成功(Yu et al, 2014);与此类似,中国台湾IT企业逐步将其研发活动拓展至大陆,除了缩短研发转产时间外,更多是基于大陆低成本的研发人才所产生的人力资本放大效应(Chen et al, 2004);而大量电子产业FDI向青岛的汇聚,则主要是因为青岛具有较高的产业集聚水平和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Kim et al, 2008)。由此可见,转移企业地方嵌入不仅可以充分利用承接地的区位优势,而且能降低转移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风险。这种为了强化自身竞争力而进行的地方嵌入,应被理解为一种“主动嵌入”过程。

与上述观点不同,全球化理论更加强调“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的意义,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内部化”理论也认为大公司采用垂直的、等级制的组织形式可绕过外部市场并降低交易成本,因此转移企业更希望建立自己的“个人俱乐部”,并弱化其在承接地产业网络中的嵌入程度。从世界范围看,东欧、北美、中国的确存在一些转移企业“嵌入不足”或“伪嵌入”现象(Uzzi, 1997; Hardy, 1998; Lowe et al, 1999; Wei et al, 2013)。但需要注意的是,正如经济社会学所强调的那样,一切经济活动都嵌入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并被社会环境所定位,承接地的制度环境、文化传承对转移企业地方嵌入也产生着潜移默化的约束和影响。比如,中国政府提出的“产品本土生产率”要求客观上推动了汽车产业FDI在中国的深度嵌入,其经济嵌入行为受制度环境的约束尤为明显(刘作丽等, 2011)。为了更好解释转

移企业在承接地消极而被动的嵌入行为,有学者提出了“被动嵌入”的概念,以此来区别转移企业为了市场、土地、劳力等因素而在承接地进行的“主动嵌入”(刘卫东, 2003; Liu et al, 2006)。

4 转移企业地方嵌入影响因素

转移企业地方嵌入是转—承双方关系发展、网络形成、嵌入深化的过程,具有高度的关系建构性、情景敏感性、路径依赖性、集聚经济性、尺度相关性(赵建吉, 2014),交易成本、社会资本、制度厚实、产业集聚、路径依赖都对转移企业地方嵌入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如果转—承双方存在技术、制度、空间、结构等不匹配(mismatch)状况,则会制约转移企业的地方嵌入(Wei et al, 2011; Wei et al, 2012)。

经济地理学者认为承接地的劳动力价格、市场规模、供应网络、创新能力、空间组织等地方特质,对转移企业地方嵌入行为和效果的影响很大。①承接地的产业条件。降低成本和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因,劳动力接近、市场接近是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的重要因素,富士康落户郑州、成都就是劳动力接近的典型案列。另外,承接地的产业基础也会影响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程度,地方配套能力不足则容易导致“伪嵌入”现象发生(Wei et al, 2013)。②承接地的学习创新能力。高科技的转移企业会更加重视承接地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更倾向于选择在一些“技术接近”的区域实施地方嵌入战略。③承接地区域文化和社会资本。一般而言,文化接近或身份认同会显著促进转移企业地方嵌入。比如,潘少奇(2015)分析了转移企业地方嵌入对民权制冷产业集群成长的影响,发现基于“老冰熊”身份认同所形成的隐性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区域企业网络构建的本底,并对转移企业地方嵌入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④承接地的制度环境和议价能力。承接地政府的管理水平、政策导向和议价能力也会对转移企业地方嵌入产生显著影响。比如,苏州及苏南模式被认为具有更强的政策主动性,所以在20世纪末吸引了大批台资PC企业从珠三角迁往长三角(王缉慈等, 2003)。

转移企业作为地方嵌入的主体,本身也具有很强的内生异质性,企业来源类型、管理模式、文化特点、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也是影响其地方嵌入的重要变量。①转移企业的母国来源。对于跨国投资而言,母国和东道国的关系会显著影响转移企业

地方嵌入深度,比如日本企业在韩国、印度的嵌入水平要明显高于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嵌入水平,主要是因为国家间的亲和力(country's affinity)能提高东道国与投资方之间的互信,并且能在经济活动中降低交易成本(Chey, 2012)。

②转移企业的管理模式。有实证研究发现,源自美国的企业具有相对松散的商业系统,更容易融入地方经济;而源自日本、韩国的企业在全中国—地方网络中的垂直一体化程度更深,受总部的控制更强,所以地方嵌入程度相对较弱。如果将跨国公司子公司在母公司网络中的嵌入视为内部嵌入,将其在承接地的嵌入视为外部嵌入,则二者呈现负相关关系(Andersson et al, 1996)。

③转移企业隶属价值链类型及所处位置。属于生产者驱动价值链中的转移企业比较注重在承接地的地域嵌入和网络嵌入;处于消费者驱动型价值链中的转移企业则会关注消费者的价值偏好,更重视对承接地的认知嵌入和文化嵌入。

④转移企业的网络构建战略。旗舰型转移企业为避免在承接地的被动嵌入,通常会采取“供应链园区投资”模式,这种建设“个人俱乐部”的战略会明显降低转移企业的地方嵌入水平(潘峰华等, 2010)。

转移企业地方嵌入是转—承双方区位优势之间、全球价值链不同环节之间、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反复博弈的过程,参与主体和互动关系的多样性决定了转移企业地方嵌入演化过程十分复杂(叶庆祥, 2006)。一般而言,转移企业地方嵌入存在从经济嵌入逐渐向技术嵌入、社会嵌入、制度嵌入的发展深化,并呈现出“战略链接—战略嵌入—战略耦合”的演进规律(邱国栋等, 2010)。经济地理学对全球—地方耦合过程的一般认识是从“地理接近”到“关系接近”再到“制度接近”,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的演进过程恰好契合了这一基本规律。然而,在具体经济实践中,转移企业地方嵌入也具有较强的“时空情境性”和“权变性”。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异质性通道网络”作用下,跨国公司在苏州工业园的地方化结网进程表现出了与一般“接近”认识相悖的规律(艾少伟等, 2011)。中国目前仍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转移承接地,如果从更大的时间尺度看,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转移企业在中国的地方嵌入还存在明显的阶段演进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前为试探性嵌入阶段,90年代为集聚性嵌入阶段,进入21世纪后为深度嵌入阶段(邱国栋等, 2010)。

5 转移企业地方嵌入效应

产业转移是资本流和技术流的重要载体,而转移企业地方嵌入可为承接地产业发展提供一扇“区位优势窗口”。国内学者对转移企业地方嵌入效应的积极评价多源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在“第三次产业转移”浪潮中获得的跨越式发展。早期的实证结果显示,1985-1999年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大约有90%是由外商直接投资引起的(魏后凯, 2002)。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崛起无疑符合“凯恩斯主义”增加投资和“卡尔多学派”扩大出口的论点,然而从GPN视角看,更应该归因于地方生产网络与全球生产网络之间的战略耦合。跨国公司的地方嵌入可推动承接地集群在“全球—地方生产网络”中的结构性嵌入,并使集群实现从“低端发展道路”向“高端发展道路”的跨越(苗长虹, 2006)。在GPN视角之外,也有很多研究认为随着转移企业地方嵌入,承接地集群也可嵌入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并沿着价值链“微笑曲线”逐步实现产业升级和价值增值。学者们基于东莞PC产业集群(童昕等, 2001)、上海IC产业集群(文婷等, 2005)、苏州工业园(Wei et al, 2013)的研究,都证实了转移企业地方嵌入对承接地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意义。另外,转移企业地方嵌入过程中所产生的技术扩散和技术溢出对承接地产业转型升级至关重要,是地方集群实现价值链“微笑曲线”攀升的重要驱动力,这种效应在中国中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显著(罗芊等, 2016)。学界目前关于转移企业网络角色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但有研究认为,领袖型转移企业会成为全球—地方技术流动过程中的“技术守门人”,并通过“技术引进—吸收—扩散—再引进”的模式引领地方集群实现转型升级(Guo et al, 2011; 赵建吉等, 2013)。

与转移企业地方嵌入意愿的主动、被动论争相似,学界对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的区域效应也存在不同认识。中国学者主要从产业承接的实践出发,认为居于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跨国企业掌握着绝对的“技术权力”和“网络权力”,中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产业集群在与跨国公司的博弈中往往居于弱势位置,如果地方集群不能顺利实现在价值链上的攀升和跃迁,会进一步加深对跨国公司“技术权力”和“网络权力”的依附性,使双方产业级差进一步拉大,使本地集群陷入“贫困竞争”和“比较优势陷阱”

(闵成基等, 2010)。而且, 虽然具有更高技术能力的转移企业可对承接地集群产生技术溢出效应, 但如果地方集群的升级行为侵犯了转移企业的“技术权力”和核心利益, 不管是产品升级、过程升级、功能升级都会受到转移企业的阻挡和压制(Humphrey et al, 2002; 文嫣等, 2005)。另外, 还有部分学者关注转移企业嵌入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认为中国的部分区域正成为国际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避难所”; 在中国内部的产业转移进程中“污染避难所假说”也能得到实例验证(沈静等, 2012)。

6 结论与展望

转移企业地方嵌入本质是“企业—地域”的相互作用过程, 其核心是转移企业通过各种交互活动与承接地企业共建经济联系、技术合作、社会交流等互动网络, 并在地方集群嵌入GVCs和GPNs过程中发挥桥梁作用。由于转移企业地方嵌入包含了多个行为主体的互动和博弈, 并深受转移企业特质和承接地区域条件的影响, 因此在经济实践中具有多样化的表现和特征。综合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 本文形成如下基本认识:

一是转移企业地方嵌入无论在意愿上是“主动”还是“被动”, 其根本目的均是维护和强化自身竞争力, 所谓“主动嵌入”是转移企业为实现自己市场接近、劳动力接近、资源接近的战略目标而同承接地企业进行积极主动的耦合; 所谓“被动嵌入”是具有建设“个人俱乐部”倾向的转移企业在制度约束、文化影响下同地方企业进行消极被动的耦合。在世界范围的经济实践中, “被动嵌入”与“主动嵌入”都有存在的基础与可能, 但无论是哪种嵌入方式, 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 都可视为在“企业—地域”关系演化中维护并强化自身竞争力的地理敏感战略。

二是转移企业地方嵌入存在“关系培育—价值链衔接—全球与地方生产网络战略耦合”的演化路径。嵌入初期, 转—承双方会通过各种通道或接近机制建立正式或非正式联系; 随着经济联系、技术合作进一步加深, 转—承双方共同参与构建的区域企业网络不断完善, 转移企业得以实现在承接地的关系性嵌入; 随着地方资产和全球力量的进一步耦合, 承接地集群逐步嵌入GVCs和GPNs中, 转移企业也将实现在地方生产网络中的结构性嵌入。虽

然转移企业地方嵌入过程在具体“时空情境”下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权变性”, 但大部分经济实践都符合该一般规律。

三是转移企业地方嵌入是承接地集群转型升级的“区位优势窗口”。转移企业承载着资本流、技术流和信息流, 其地方嵌入可为承接地集群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带来难得的机遇。而且, 转移企业地方嵌入可引入新鲜的非冗余信息并增强集群的相关多样性, 有助于打破传统产业集群过度路径依赖导致的僵化和锁定状态。当然, 转移企业地方嵌入所带来的“贫困竞争”风险也不容忽视。

已有研究虽然对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的动因、模式、效应等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 但其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比如, 缺少转移企业在承接地企业网络中角色的定量分析, 忽视地方集群在GVCs和GPNs中的嵌入, 较少关注转移企业经济嵌入、技术嵌入、社会嵌入之间的相互影响。中国正在推动的区际产业转移为中西部地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正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这些经济实践都为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研究提供了天然“实验场”。在今后的研究中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深化:

一要构建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转移企业地方嵌入是企业关系发展、网络形成、嵌入深化的过程, 具有主体众多、尺度综合、关系纷繁、过程复杂的特点。经济地理学、演化经济学、经济社会学、企业管理学等学科都对该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解释和实证研究, 但相关研究主要基于自己的学科思想和研究范式, 较少有研究综合更多学科的理论工具沿着“关系培育—价值链衔接—全球与地方生产网络战略耦合”的路径进行系统分析。因此, 今后研究中应融合关系经济地理学、演化经济地理学、经济社会学的一些理论工具, 构建以“关系—网络—演化”为主线, 以网络—角色、嵌入—耦合、演化—升级为核心要素的综合分析框架。

二要加强转移企业网络角色和效应的定量研究。在不同的区域或行业, 转—承双方互动耦合形成的关系网络会有独特的网络结构, 占据不同网络位置的企业会拥有不同的角色和“权力”。由于缺乏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的量化网络分析, 已有研究多设定领袖型转移企业具有更强的技术能力, 因而将其视为区域企业网络的核心或“技术守门人”。然而, 由于存在转移企业对承接地企业的技术压制

现象,所以这种先验性的判断并不一定准确。此外,区域企业网络还可能存在“嵌入性悖论”问题,过度的“嵌入性依赖”会导致网络封闭和集群衰落(Uzzi, 1997; Nell, 2012)。在转移企业地方嵌入过程中是否存在“嵌入性悖论”现象,领袖型转移企业是否一定能成为区域企业网络中的“技术守门人”,这些问题还有待于通过深入的定量研究来解答。

三要加强转移企业经济嵌入、技术嵌入、社会嵌入等不同嵌入形式的相互影响研究。已有研究通常把“经济嵌入—技术嵌入—社会嵌入”视为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的一般渐进过程,但“逆向”进程的存在说明几种嵌入形式间具有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从已有的经济实践和实证研究看,转移企业在承接地良好的社会嵌入会促进其经济嵌入,产业前后向联系又会强化知识流动并加深技术嵌入(Ahuja, 2000; 毛广雄, 2010; 谭文柱, 2012)。由此可见,转移企业在承接地的三种嵌入形式密切关联,但三种嵌入过程是否同步,三者有什么相互影响,转移企业在三种网络中的位置和角色是否一致,这些问题还需借助网络分析手段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四要加强转移企业与承接地集群的“双向嵌入”研究。转移企业地方嵌入本质上是与承接地集群的互动耦合过程,随着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程度不断加深,承接地集群也可以通过关系培育、价值链衔接、生产网络构建积极嵌入GVCs和GPNs中。因此,转移企业在承接地的嵌入更应该被视为转移企业地方嵌入、承接地集群全球生产网络嵌入的“双向嵌入”过程。目前,一方面中国的区际产业转移方兴未艾,另一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规模迅速扩大。今后,学界要不断加强转移企业与承接地集群的“双向嵌入”研究,既为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决策参考,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理论探索。

参考文献(References)

艾少伟, 苗长虹. 2011. 异质性“通道”与跨国公司地方化结网: 以苏州工业园为例[J]. 地理研究, 30(8): 1483-1498. [Ai S W, Miao C H. 2011. Heterogeneous "channels" and localized networking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Case of Suzhou Industrial Park[J]. Geographical Research, 30(8): 1483-1498.]

陈景辉, 邱国栋. 2008.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产业集群的“双向嵌入观”[J]. 经济管理, (11): 6-11. [Chen J H, Qiu G D. 2008. An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of the embeddedness in the two-way and interactive coupling between TNC

global value chain and local industrial clusters[J]. Economic Management, (11): 6-11.]

陈肖飞, 苗长虹, 潘少奇, 等. 2018. 轮轴式产业集群内企业网络特征及形成机理: 基于2014年奇瑞汽车集群实证分析[J]. 地理研究, 37(2): 353-365. [Chen X F, Miao C H, Pan S Q, et al. 2018.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enterprise networks in "Hub- and- Spoke" cluster: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ery cluster in 2014, China[J]. Geographical Research, 37(2): 353-365.]

贺灿飞, 陈颖. 1997. 港澳地区对中国内地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空间扩散[J]. 地理科学, 17(3): 193-200. [He C F, Chen Y. 1997. Locational distribution and spatial diffusion of Hong Kong- Macao's FDI in China [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17(3): 193-200.]

贺灿飞, 梁进社. 1999.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异及其变化[J]. 地理学报, 54(2): 97-105. [He C F, Liang J S. 1999.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54(2): 97-105.]

景秀艳, 曾刚. 2007. 全球与地方的契合: 权力与生产网络的二维治理[J]. 人文地理, 22(3): 22-27. [Jing X Y, Zeng G. 2007. Consistency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Power and two-dimensional governance of production network[J]. Human Geography, 22(3): 22-27.]

李国平, 等. 2016. 产业转移与中国区域空间结构优化[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Li G P, et al. 2016.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optimization of regional spatial structure in China[M]. Beijing, China: Science Press.]

李新建. 1996. 香港对大陆投资的区位变化与公司空间行为[J]. 地理学报, 51(3): 213-223. [Li X J. 1996. Locational behaviour of Hongkong business investment in mainland Chin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51(3): 213-223.]

刘卫东. 2003. 论全球化与地区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 被动嵌入[J]. 世界地理研究, 12(1): 1-9. [Liu W D. 2003.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local development: Obligated embeddedness[J]. World Regional Studies, 12(1): 1-9.]

刘作丽, 贺灿飞. 2011. 集聚经济、制度约束与汽车产业跨国公司在华功能区位[J]. 地理研究, 30(9): 1606-1620. [Liu Z L, He C F. 2011. Agglomeration, institutions and the functional location of auto TNCs in China[J]. Geographical Research, 30(9): 1606-1620.]

罗芊, 贺灿飞, 郭琪. 2016. 基于地级市尺度的中国外资空间动态与本土产业演化[J]. 地理科学进展, 35(11): 1369-1380. [Luo Q, He C F, Guo Q. 2016.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domestic industrial change in Chinese prefecture-level cities [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5(11): 1369-1380.]

毛广雄. 2010.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产业转移研究: 江苏南北共建开发区模式解析[J]. 人文地理, 25(4): 91-96. [Mao G X. 2010. A research on industrial transfer based on

- the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An analysis on model of development zones co-constructed by southern Jiangsu and northern Jiangsu[J]. *Human Geography*, 25(4): 91-96.]
- 梅丽霞, 王缉慈. 2009. 权力集中化、生产片断化与全球价值链下本土产业的升级[J]. *人文地理*, 24(4): 32-37. [Mei L X, Wang J C. 2009. Power concentration, production fragmentation, and local upgrading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J]. *Human Geography*, 24(4): 32-37.]
- 苗长虹. 2004. 变革中的西方经济地理学: 制度、文化、关系与尺度转向[J]. *人文地理*, 19(4): 68-76. [Miao C H. 2004. Western economic geography in transformation: Insitutional, cultural, relational and scalar turns[J]. *Human Geography*, 19(4): 68-76.]
- 苗长虹. 2006. 全球—地方联结与产业集群的技术学习: 以河南许昌发制品产业为例[J]. *地理学报*, 61(4): 425-434. [Miao C H. 2006. Global-local nexus and technological learn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 A case study of hair-goods industry in Xuchang, Henan Province[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1(4): 425-434.]
- 闵成基, 杨震宁, 王以华. 2010. 权力依附关系和关系嵌入对知识流入的影响: 以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为例[J]. *科学学研究*, 28(3): 412-419, 435. [Min C J, Yang Z N, Wang Y H. 2010. Power and relational embeddedness's impact on knowledge inflow: Taking MNC's subsidiary in China for example[J]. *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 28(3): 412-419, 435.]
- 潘峰华, 王缉慈. 2010. 从“被动嵌入”到供应链园区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的新模式[J]. *中国软科学*, (3): 95-102, 110. [Pan F H, Wang J C. 2010. From obligated embeddedness to supplier chain park investment: A new mode of FDI[J]. *China Soft Science*, (3): 95-102, 110.]
- 潘少奇. 2015. 转移企业与承接地企业互动发展研究: 以民权制冷产业集群为例[D]. 开封: 河南大学. [Pan S Q. 2015. Research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ansferred enterprise and local enterprise: Take the refrigeration industrial cluster of Minquan County as an example[D]. Kaifeng, China: Henan University.]
- 邱国栋, 陈景辉. 2010. 跨国公司在中国沿海开发区的嵌入性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 (9): 88-95. [Qiu G D, Chen J H. 2010. The embeddednes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China's coastal development zones[J]. *Research on Financial and Economic Issues*, (9): 88-95.]
- 沈静, 向澄, 柳意云. 2012. 广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机制: 基于2000-2009年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J]. *地理研究*, 31(2): 357-368. [Shen J, Xiang C, Liu Y Y. 2012. The mechanism of pollution-intensive industry reloca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2000-2009[J]. *Geographical Research*, 31(2): 357-368.]
- 谭文柱. 2012. 社会关系嵌入与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 宁波服装业案例研究[J]. *地理科学*, 32(7): 835-839. [Tan W Z. 2012. Social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firm reloc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garment industry in Ningbo, China[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32(7): 835-839.]
- 童昕, 王缉慈. 2001. 东莞PC相关制造业地方产业群的发展演变[J]. *地理学报*, 56(6): 722-729. [Tong X, Wang J C. 2001. Local clustering: A case study on PC-related manufacturing in Dongguan[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56(6): 722-729.]
- 王缉慈, 罗家德, 童昕. 2003. 东莞和苏州台商PC产业群的比较分析[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3(2): 6-10. [Wang J C, Luo J D, Tong X. 2003. A comparison between Taiwanese PC-related industrial clusters in Suzhou and Dongguan[J].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2): 6-10.]
- 魏后凯. 2002.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J]. *经济研究*, (4): 19-26, 92-93. [Wei H K. 2002. Effe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4): 19-26, 92-93.]
- 文嫣, 杨友仁, 侯俊军. 2007. 嵌入性与FDI驱动型产业集群研究: 以上海浦东IC产业集群为例[J]. *经济地理*, 27(5): 741-746. [Wen H, Yang Y R, Hou J J. 2007. Study of embeddedness and FDI-driven industrial cluster: Case of Pudong IC industrial cluster[J]. *Economic Geography*, 27(5): 741-746.]
- 文嫣, 曾刚. 2005.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地方产业网络升级研究: 以上海浦东集成电路产业网络为例[J]. *中国工业经济*, (7): 20-27. [Wen H, Zeng G. 2005. Study of global value chain governance and local industrial network upgrading: Case of Pudong integrated circuit industrial network [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y*, (7): 20-27.]
- 杨玲丽. 2015. “嵌入性”约束下的产业转移制度安排: 江苏省南北挂钩共建产业园区的经验借鉴[J]. *科技进步与对策*, 32(5): 48-53. [Yang L L. 2015. Industrial transfer system arrangement of embeddedness under the constraint: Experience of establishing industrial park with south and north in Jiangsu[J].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32(5): 48-53.]
- 杨伟聪. 2017. 全球生产网络、价值捕捉轨迹与区域发展[J]. *热带地理*, 37(5): 628. [Yeung H W-C. 2017.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J]. *Tropical Geography*, 37(5): 628.]
- 叶庆祥. 2006. 跨国公司本地嵌入过程机制研究[D]. 杭州: 浙江大学. [Ye Q X. 2006. Mechanism of the local embeddednes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D]. Hangzhou, China: Zhejiang University.]
- 曾咏梅. 2011. 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模式研究[J]. *经济地理*, 31(3): 453-457. [Zeng Y M. 2011. Study on the imbedding mode of industry clusters into global value

- chains[J]. *Economic Geography*, 31(3): 453-457.]
- 张建伟, 王艳华, 赵建吉, 等. 2016. 产业转移与创新能力互动机制的研究进展[J]. *世界地理研究*, 25(3): 133-141. [Zhang J W, Wang Y H, Zhao J J, et al. 2016.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between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innovation ability[J].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5(3): 133-141.]
- 张占仁, 杜德斌. 2016. 全球研发网络嵌入障碍及升级困境问题研究综述[J]. *经济地理*, 36(8):1-7. [Zhang Z R, Du D B. 2016. A review on the study of the embed barriers and upgrade dilemma of the global R&D network[J]. *Economic Geography*, 36(8):1-7.]
- 赵建吉, 茹乐峰, 段小微, 等. 2014. 产业转移的经济地理学研究: 进展与展望[J]. *经济地理*, 34(1): 1-6. [Zhao J J, Ru L F, Duan X W, et al. 2014. Industrial transfer study in economic geography: Progress and prospect [J]. *Economic Geography*, 34(1): 1-6.]
- 赵建吉, 曾刚. 2013. 基于技术守门员的产业集群技术流动研究: 以张江集成电路产业为例[J]. *经济地理*, 33(2): 111-116. [Zhao J J, Zeng G. 2013. The study on technological gatekeepers in technological flow of the industrial clusters: A case study of IC industrial cluster in Zhangjiang Hi-Tech Park[J]. *Economic Geography*, 33(2): 111-116.]
- Ahuja G. 2000. Collaboration networks, structural holes, and innovation: A longitudinal study[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5(3): 425-455.
- Andersson U, Forsgren M. 1996. Subsidiary embeddedness and control in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5(5): 487-508.
- Bagchi-Sen S, Wheeler J O. 1989. A spatial and temporal model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J]. *Economic Geography*, 65(2): 113-129.
- Buckley P J, Clegg J, Tan H. 2006. Cultural awareness in knowledge transfer to China: The role of Guanxi and Mianzi[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41(3): 275-288.
- Chen S H. 2004. Taiwanese IT firms' offshore R&D in China and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global innovation network[J]. *Research Policy*, 33(2): 337-349.
- Chey H K. 2012. The impact of affinity on world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case of Japa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24(1): 57-63.
- Christopherson S. 2007. Barriers to 'US style' lean retailing: The case of Wal-Mart's failure in Germany[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7(4): 451-469.
- Coe N M, Hess M, Yeung H W-C, et al. 2004. 'Globaliz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A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perspective[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9(4): 468-484.
- Coe N M, Lee Y S. 2006. The strategic localization of transnational retailers: The case of Samsung-Tesco in South Korea [J]. *Economic Geography*, 82(1): 61-88.
- Depner H, Bathelt H. 2005. Exporting the German model: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automobile industry cluster in Shanghai[J]. *Economic Geography*, 81(1): 53-81.
- Giroud A, Jindra B, Marek P. 2012. Heterogeneous FDI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A novel approach to assess the developmental impact of backward linkages[J]. *World Development*, 40(11): 2206-2220.
- Granovetter M.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 481-510.
- Guo B, Guo J J. 2011. Patterns of technological learning within the knowledge systems of industrial clusters in emerging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China[J]. *Technovation*, 31 (2-3): 87-104.
- Hardy J. 1998. Cathedrals in the desert? Transnationals, corporate strategy and locality in Wrocław[J]. *Regional Studies*, 32(7): 639-652.
- Henderson J, Dicken P, Hess M, et al. 2002.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9(3): 436-464.
- Hess M. 2004. 'Spatial' relationships? Towards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embeddedness[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8(2): 165-186.
- Hess M, Yeung H W-C. 2006. Whither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 economic geograph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8(7): 1193-1204.
- Hsu J-Y. 2006. The dynamic firm-territory nexus of Taiwanese informatics industry investments in China[J]. *Growth and Change*, 37(2): 230-254.
- Humphrey J, Schmitz H. 2002. 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J]. *Regional Studies*, 36(9): 1017-1027.
- Kim J Y, Zhang L-Y. 2008. Formation of FDI clustering - A new path to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electronics cluster in Qingdao City[J]. *Regional Studies*, 42(2): 265-280.
- Liu W D, Dicken P. 2006.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bligated embeddednes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s automobile industry[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8(7): 1229-1247.
- Lowe N, Kenney M. 1999.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e global geography of production: Why the Mexican consumer electronics industry failed[J]. *World Development*, 27(8): 1427-1443.
- Nell P C, Andersson U. 2012. The complexity of the business network context and its effect on subsidiary relational

- (over-) embeddedness[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1(6): 1087-1098.
- Schive C, Majumdar B A. 1990.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nd linkage effects: The experience of Taiwan[J]. *Canadi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1(2): 325-342.
- Sun H. 1996.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nd linkage effects: The experience of China[J]. *Asian Economics*, 25(1): 5-28.
- Uzzi B. 1997.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2(1): 35-67.
- Wei Y H D, Liao F H F. 2013. The embeddednes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Chinese cities: Strategic coupling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J]. *Habitat International*, 40: 82-90.
- Wei Y H D, Liefner I, Miao C-H. 2011. Network configurations and R&D activities of the ICT industry in Suzhou Municipality, China[J]. *Geoforum*, 42(4): 484-495.
- Wei Y H D, Zhou Y, Sun Y F, et al. 2012. Production and R&D networks of foreign ventures i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technological dynamism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J]. *Applied Geography*, 32(1): 106-118.
- Yeung, H W-C. 1997. Business network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 study of Hong Kong firms in the ASEAN region[J]. *Economic Geography*, 73(1): 1-25.
- Yeung H W-C. 2005. The firm as social networks: An organisational perspective[J]. *Growth and Change*, 36(3): 307-328.
- Yu J, Zhang Y, Gao P. 2014. Motivation and strategy: MNCs' embeddedness in China's standardization based innovation [J].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38(10): 890-901.
- Zukin S, DiMaggio P. 1990. Structures of capital: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economy[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bates and research trends of local embeddedness of transferred enterprises

PAN Shaoqi^{1,2}, LI Yating², MIAO Changhong², LI Jiangsu², LV Kewen²

(1. 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Henan, China; 2. Key Research Institute of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n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of Henan Provinc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Henan,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embeddedness" is useful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interactive coupling of transferred enterprises, the industrial clusters of receiving places, and the global or trans-regional production network.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embeddedness" in economic geography, there exist a debate of "active" and "passive" local embedded intentions of transferred enterprises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as well as two different views of positive effect and negative effect of local embedding of transferred enterprises. By systematically examining studies on the main motivations, influencing factors, evolution processes, regional effects, and so on of the local embeddedness of transferred enterprises,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regardless of the willingness of enterprises, the local embeddedness of transferred enterprises is a geographic sensitive strategy to protect and strengthen their competitiveness in the evolution of firm-territory nexus. The embedding process is affected by the condition of the undertaking places and the quality of the transferred enterprises. The embedding process follows the path of "foster relationship-value chain cohesion-build global-local production network," and gradually achieves relational embedding and structural embedding. The local embeddedness of transferred enterprises provides a "window of locational opportunity"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enterprises and industrial clusters of the undertaking places. Finally,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four research directions that need to be deepened and strengthened: (1)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framework that uses "relation-network-evolution" as the main line; (2) strengthening quantitative research of the network role and performance of transferred enterprises; (3) enhancing the research of the interaction of the economic, technological, and social embeddedness of the transferred enterprises; and (4) promoting the research of the "two-way embeddedness" of transferred enterprises and the industrial clusters of the undertaking places.

Key words: industrial transfer; transferred enterprises; local embeddedness; research trend